

这里诞生了党史上第一个中央监察委员会

在武汉革命博物馆回望党的纪律建设光辉历程

法治号中国行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何正鑫

长江之畔，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都府堤，一条约五百米长的老街上，一片庄重的历史建筑群静静矗立。这里曾是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旧址，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如今，在毗邻会址的武汉革命博物馆，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以425件文物资料、700余幅珍贵历史照片，系统展示了党的纪律建设光辉历程，成为追溯红色法治源头的热门“打卡地”。

危难之际 翻开新章

历史的指针回拨至1927年的春天。彼时的中国，革命形势风云突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危难之际，中共五大在武汉紧急召开。1927年5月9日，大会最后一天，选举产生了由王荷波、杨匏安、许白昊等10人组成的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当时，武汉已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组建中央监察委员会，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既是革命形势倒逼的结果，也是组织建设的迫切需要。

中共四大以前，党员数量不足千人。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到1927年4月，党员人数增至57967人。党员队伍迅速扩大的同时，部分党员出现思想动摇、作风不纯等问题，设立专门机构监督纪律，纯洁组织，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中共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将严守政治纪律提升到全党共同义务的高度。会后不久，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首次设立“监察委员会”专章，明确其首要职能是“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纪律’二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崔媛媛看来，中共五大开启了用铁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以法治精神规范政党行为的伟大探索。

2019年5月9日，“纪律建设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览在武汉革命博物馆正式亮相。

展览分为“创立与探索”“推进与曲折”“恢复与发展”“新时代新征程”4个部分，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程，反映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纪律建设理念、战略方针及主要成果。

“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览，填补了国内党的纪律建设展览的空白。”崔媛媛说。

截至目前，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累计接待观众超过300万人次。

热血护纪 丹心立法

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内，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蔡以忱使用过的一柄短剑和一枚徽章，静静述说着往事。

1928年7月，蔡以忱在湖南澧县组织武装暴动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他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后于同年10月壮烈牺牲，就义前留下“申鸣大义，仗剑扫烟尘；横刀眉相笑，忠贞抛昆仑”的绝笔。

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中，8人先后牺牲在刑场或战场上，1人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下落不明，仅有1人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用热血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信仰，无一入叛党投敌，无一入变节求荣，用行动诠释了“执纪者必先守纪”的铮铮誓言。

陈列展上一件件文物背后的故事，武汉革命博物馆讲解员朱欣妍早已铭记于心。提及党的早期法治实践，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和脱了底的黑皮鞋。

“这是董必武先生在参加开国大典时穿过的衣服和皮鞋。”朱欣妍介绍，这位从湖北黄安（今红安）走出的革命家，是党内早期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受过正规法律教育并从事过律师职业的人。

在中共五大纪念馆，陈列着两部中国共产党早期制定的刑事法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均为仿具件）。

1927年2月，工农革命运动空前高涨之际，湖北阳新县反动势力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惨案：9名共产党员、工农革命者惨遭火焚。

董必武闻讯极为愤怒，提出必须用法律形式保护农民运动的正常发展。当年3月，董必武与邓初民共同起草前述两个条例，成为党的早期法治实践的重要标志。

1933年，董必武参与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

行为》正式发布。这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反腐败的量刑标准。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董必武正式提出“依法办事”的著名论断，为此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石。

“红巷”育苗 薪火相传

“向一切贪污腐败违背党章的行为，斗争到底！”“永别了，我的亲人！永别了，我的同志！……将来，如果你们过上了我们所追寻的好日子，请珍惜啊！请珍惜！”

2月21日，在中共五大纪念馆前，沉浸式实景剧《监委主席王荷波》，将观众带回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庄严的宣誓与跨越时空的对话，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

这是武汉革命博物馆推出的沉浸式思政剧目之一。

近年来，武汉革命博物馆集中打造了“红巷有理”“红巷有礼”品牌矩阵，推出“我在红巷讲党史”“红巷里的思政课”“红巷学社”等系列品牌，采取思政教育、情景演出、红色宣讲等形式，让红色历史“活”起来，让法治精神“润”人心。

“我们希望红色故事不只进入观众的耳朵，也要进入观众的心灵。”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王玲说，“观众在这里领略到的，不仅是革命旧址和红色展览的风采，更是法治精神的传承。沉浸式学习实践有助于将法治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为扩大红色法治宣传覆盖面，武汉革命博物馆还与武汉近百家单位建立合作共建关系，精心设计多条研学线路，建立“红巷育苗”“红巷青马”等为主体的志愿服务体系，累计培养志愿者4000余名。

记者采访时，“红巷育苗”小志愿者源源手持“成长手册”，正自信大方地讲解。他的妈妈付女士则在旁边用手机记录这一幕：“孩子在讲解红色故事的同时，也在心中播下了爱党爱国的种子。”

武汉革命博物馆还积极打造数字展馆，实现实体陈列展的时空延伸和用户拓展。同时，采取联合办展形式，推动“纪律建设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走向全国，推出“信仰铸忠诚——中国共产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专题展”，持续讲好纪律与法治的故事。

在万灯看来，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纪律与法治精神深植于管党治党与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从首届中央监委于危难中诞生，到新时代纪律建设与法治建设深度融合，一条红线贯穿始终：严明纪律是生命线，法治精神是坚强根基。

红色法治，薪火相传。这条始于武昌都府堤的红色足迹，承载着革命先烈的忠诚与坚守，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正向着未来，坚定延伸。

图① 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召开会议时的复原场景。

图② 沉浸式实景剧《监委主席王荷波》演出现场。

图③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展外观。武汉革命博物馆供图



法治文化

专刊 05

LEGAL DAILY

2026年3月22日 星期日

主编/王宇

见习编辑/尹丽

美工/高岳

校对/魏巍

邮箱/fzwh202678@legaldaily.com.cn

红色法治地标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位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占地约10亩，距铜川市新区40余公里。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立于1934年1月，1937年3月改称陕甘宁特区，同年5月改称陕甘宁边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把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与陕甘边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照金纪念馆于2004年首次对外开放，2012年实施改扩建，2013年9月重新开放运行。新建成的照金纪念馆建筑面积6500平方米，展厅共有两层。一层为序厅、主展厅，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为主线，用翔实的历史资料、图片、文物和各种现代展陈技术，再现了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历程，突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两点一存”（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二层为陕甘边革命英雄纪念馆及主题油画展区，开设了百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专题展区；以重大的革命事件为主题的油画作品，用艺术的手法呈现了历史场景。

在听书赏曲中消怨气明法理

——宝丰县人民检察院说唱普法促调解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陈彦培 冯军华

“磁拉板打响叮当，听俺把消气调解唱一唱。城西有个大张庄，一家姓李一家姓王。只因为三尺风道惹的祸，两家才把和气伤。你要争，他不让……”3月1日，农历正月十三，在一年一度的马街书会上，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人民检察院干警丁延鹏表演的河南坠子《消气歌》，令现场群众耳目一新。

马街书会历史悠久。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三，不论阴晴雨雪，来自全国各地的说书艺人负鼓抱琴来到马街，以天作幕，以地为台，说书会友，弹唱献艺。2006年，马街书会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土生土长的宝丰人，宝丰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谷英格自幼浸润在说唱文化的氛围中。“群众爱听戏、懂戏，如何把群众的这种爱好与法治宣传结合起来？”每年马街书会期间，这个问题总会萦绕在她心头。

在这里，说书人随便找一块地方，或在宽阔的田野里，或在卵石漫地的河滩，桌凳一摆，就开始亮出自己的拿手绝活，比拼着谁的摊前人气旺、喝彩声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听书人里，有白发苍苍的耆老，有稚气未脱的少年，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一派热闹景象。

“咱们干警中有那么多说唱爱好者，不是也可以在马街书会上表演吗？咱们检察机关也要把法治宣传以说唱的形式在马街书会上亮相。”今年春节前，宝丰县检察院党组书记王雅丽的提议得到了干警们的热烈响应。

由宝丰县检察院与宝丰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创作的河南坠子《消气歌》，由宝丰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阿卫国作词，丁延鹏负责表演。“我们还提议在《消气歌》中加上六尺巷的故事。”谷英格介绍说，“经过反复打磨，最终修上了‘六尺巷’的故事咱不能忘，宰相写书劝礼让。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小人心量小气短，生气好比吹气筒。别人气我我不气，气人

了自身没人帮”的唱段。”

受《消气歌》的启发，宝丰县检察院设立“消气工作室”。王雅丽介绍说，“消气工作室”核心内涵在于将检察履职与法治宣传、基层治理深度融合。通过开展法治化、人性化、多元化的调解工作，搭建起一个既说法理、又讲情理、更能平心气的沟通平台，通过“听”一曲《消气歌》舒缓情绪，“讲”透法理情理明是非，“顺”畅心气消除隔阂，“平”复情绪达成共识，力求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没想到《消气歌》在马街书会上表演后，那么受欢迎！截至目前，已有近20个单位，邀请我们去表演，群众在听书赏曲中消怨气、明法理。”谷英格说。

72岁的王大娘曾因购物与摊贩发生争执，满心郁结难平。听完《消气歌》后，她的眉头渐渐舒展，喝着检察干警递来的热茶说：“唱词里说的‘吃亏容人是智慧，争强好胜易遭殃’在理儿，我这心里的疙瘩彻底解开，心气儿也顺了。”

“将法治宣传、矛盾纠纷化解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接地气、冒热气。”王雅丽感叹道，“宝丰说唱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荟萃了河南坠子、评书、琴书、大鼓书等多种说唱艺术形式，承载着丰富的民间故事、历史传说和乡土智慧。《消气歌》之所以受欢迎，与文化传承密不可分。”

“我们在办案中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想几个怎么办，或许就能化解当事人心头的烦心事。”检察官高艳霞办理的一起故意伤害案中，刚满16岁的崔某因与同乡刘某发生口角，一时冲动动手致刘某轻伤二级。崔某坦言，自己上初中时父母双亡，各各奶奶早已离世，哥哥常年在外务工，他只能跟着年迈的姥爷姥爷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高艳霞去崔某家走访时，映入眼帘的是三间墙皮剥落的砖房。她得知，崔某平时十分懂事，放学回家就主动帮姥爷姥爷干活。邻里也称赞崔某：“他是个好孩子，就是苦。”

“如果按程序起诉，这孩子的人生或许就会拐个弯。

以清晰呈现。AI的可视化能力可以弥补这一不足。比如，AI可以生成清晰的流程图，展现案件在不同机构间的流转程序；可以制作时间轴，直观显示某一法律制度在历史上的变迁过程。这种“看得见”的分析，不仅使研究更加严谨，也使成果更容易被理解和传播。

在研究效率上，AI可以将学者从繁琐的资料梳理中解放出来。以往，要研究某个特定问题，学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寻找相关记载。现在，AI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初步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使学者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深度分析和理论构建中。虽然最终的价值判断仍需人脑，但前期工作的效率已不可同日而语。

AI时代的“守正”与“创新”

当然，面对AI带来的种种便利，我们仍需保持清醒的认识。技术再先进，也只是工具；真正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生命力的，应是其中蕴含的跨时代价值。因此，在利用AI进行研究的道路上，必须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守正”就是要坚守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AI基于数据和算法运行，擅长发现规律和关联性，却难以彻底理解这些深厚的人文价值。如果完全依赖AI的分析，我们可能会得到一堆冷冰冰的数据和模式，却丢失了传统法律文化中最有温度、最富智慧的部分。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与AI“对话”，通过它提出各种试探性问题，获取初步的分析和线索。AI虽然不能直接给出最终答案，但它可以快速梳理相关材料，提供可能的分析方向，激发我们的思考。

在研究过程中，AI让论证更加直观和系统。传统法律史研究多以文字描述为主，对于复杂的制度运作或观念演变，有时难以清晰呈现。AI的可视化能力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守正”就是要坚守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AI基于数据和算法运行，擅长发现规律和关联性，却难以彻底理解这些深厚的人文价值。如果完全依赖AI的分析，我们可能会得到一堆冷冰冰的数据和模式，却丢失了传统法律文化中最有温度、最富智慧的部分。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与AI“对话”，通过它提出各种试探性问题，获取初步的分析和线索。AI虽然不能直接给出最终答案，但它可以快速梳理相关材料，提供可能的分析方向，激发我们的思考。

在研究过程中，AI让论证更加直观和系统。传统法律史研究多以文字描述为主，对于复杂的制度运作或观念演变，有时难以清晰呈现。AI的可视化能力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守正”就是要坚守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AI基于数据和算法运行，擅长发现规律和关联性，却难以彻底理解这些深厚的人文价值。如果完全依赖AI的分析，我们可能会得到一堆冷冰冰的数据和模式，却丢失了传统法律文化中最有温度、最富智慧的部分。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与AI“对话”，通过它提出各种试探性问题，获取初步的分析和线索。AI虽然不能直接给出最终答案，但它可以快速梳理相关材料，提供可能的分析方向，激发我们的思考。

在研究过程中，AI让论证更加直观和系统。传统法律史研究多以文字描述为主，对于复杂的制度运作或观念演变，有时难以清晰呈现。AI的可视化能力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守正”就是要坚守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AI基于数据和算法运行，擅长发现规律和关联性，却难以彻底理解这些深厚的人文价值。如果完全依赖AI的分析，我们可能会得到一堆冷冰冰的数据和模式，却丢失了传统法律文化中最有温度、最富智慧的部分。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与AI“对话”，通过它提出各种试探性问题，获取初步的分析和线索。AI虽然不能直接给出最终答案，但它可以快速梳理相关材料，提供可能的分析方向，激发我们的思考。

要学习与AI有效协作的技能，知道如何向AI提出好问题、如何评估和验证AI的输出结果、如何将AI的分析与人文阐释有机结合。学术共同体也应形成相应的规范和共识，如明确说明AI参与程度、区分AI发现与研究者的阐释，确保技术赋能不减学术严谨性。

迈向有温度的数字人文

未来，AI与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结合，应指向构建“有温度的数字人文”研究范式。这里的“温度”，指的是技术应用背后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坚守。在这种范式中，AI和研究者各展所长，形成互补。AI的优势在于处理大规模信息、发现复杂模式、进行高效计算；研究者的优势则在于价值判断、意义阐释和创造性思考。理想的研究过程，应当是合理利用AI进行资料处理和初步分析，辅助深度思考，最终形成有见解、有温度的研究成果。

此外，这种研究范式不仅能够产出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能帮助优秀传统文化以更具生命力的方式走进公众视野。通过AI辅助的可视化呈现、互动式展示，一些原本艰深的法律典籍、复杂的制度设计，可以变得直观易懂，让更多人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智慧，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法律与道德的良性互动、司法中的情理考量等，对于完善当代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启示。通过AI的助力，我们也可以更系统地、更深入地挖掘这些智慧，思考如何在现代条件下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应用。

总而言之，在AI时代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应当怀抱开放而审慎的态度。积极拥抱新技术带来的可能性，同时始终保持对文化价值的敬畏和坚守；充分利用AI提升研究效率，同时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数字浪潮中，既不固步自封的守旧者，也不盲目跟风的技术流，而是真正成为传统智慧的传承者与革新者。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守正”就是要坚守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AI基于数据和算法运行，擅长发现规律和关联性，却难以彻底理解这些深厚的人文价值。如果完全依赖AI的分析，我们可能会得到一堆冷冰冰的数据和模式，却丢失了传统法律文化中最有温度、最富智慧的部分。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与AI“对话”，通过它提出各种试探性问题，获取初步的分析和线索。AI虽然不能直接给出最终答案，但它可以快速梳理相关材料，提供可能的分析方向，激发我们的思考。

在研究过程中，AI让论证更加直观和系统。传统法律史研究多以文字描述为主，对于复杂的制度运作或观念演变，有时难以清晰呈现。AI的可视化能力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守正”就是要坚守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AI基于数据和算法运行，擅长发现规律和关联性，却难以彻底理解这些深厚的人文价值。如果完全依赖AI的分析，我们可能会得到一堆冷冰冰的数据和模式，却丢失了传统法律文化中最有温度、最富智慧的部分。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与AI“对话”，通过它提出各种试探性问题，获取初步的分析和线索。AI虽然不能直接给出最终答案，但它可以快速梳理相关材料，提供可能的分析方向，激发我们的思考。

在研究过程中，AI让论证更加直观和系统。传统法律史研究多以文字描述为主，对于复杂的制度运作或观念演变，有时难以清晰呈现。AI的可视化能力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守正”就是要坚守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AI基于数据和算法运行，擅长发现规律和关联性，却难以彻底理解这些深厚的人文价值。如果完全依赖AI的分析，我们可能会得到一堆冷冰冰的数据和模式，却丢失了传统法律文化中最有温度、最富智慧的部分。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与AI“对话”，通过它提出各种试探性问题，获取初步的分析和线索。AI虽然不能直接给出最终答案，但它可以快速梳理相关材料，提供可能的分析方向，激发我们的思考。